

往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四十期 二零零六年七月七日

编者的话：面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社会，有些过来人很怀念意气风发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以为那是个完美的年代，理想高张，道德纯洁，“我们走在大路上”。那一时期其实还有另一面，如陈懋智老人所述之“三反”——《灵魂哭泣的日子》。

那一时期，在消灭了地主阶级，消灭了“反革命”之后，开始对资产阶级下手了。采取的照例是勾连政策：“老虎上街咬伤（商）人”。

此类运动不但触及灵魂还要触及肉体，不但伤害无辜还要诛连亲友，不但剥夺财产，消灭思想，摧残人性，还要消灭生命……三反运动究竟整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至今是谜。做为个案，陈懋智老人的叙述为那段历史留下了见证——相信不会是孤证。

文中记载的那些很有独创性的刑法和审讯技巧令人眼界大开，那些审讯者的嘴脸更教人叹为观止。但他们不是元凶，他们是些普通人，是这部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随时可以被替换，甚至沦为这部机器的受害者。他们自以为是“自己人”，所以格外卖力，不惜伤天害理，罗织构陷。在此种氛围下，良心和常识遂成为累赘和祸端。真正的悲剧在于，他们在充当凶手的时候想不到日后的下场，不知他们在沦为受害者时是否想到当初的所作所为。

怀念那个年代的人们，同时应该反思：

清白无辜的人为什么会被投进监狱？

正派廉洁的人为什么会承认自己有罪？

忠厚善良的人为什么会血口喷人？

朝夕相处的同事为什么会变成仇敌？

天真无邪的妹妹为什么会无中生有检举哥哥？

所有这些不可理喻的事情为什么会堂而皇之的在光天化日下发生？

在那个年代，在道德纯洁的另一面，是对传统伦理观念的毁灭，也是对人类文明准则的彻底破坏。它戕害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灵魂。只是到了现在，我们才痛切地感到，这一损失已无法弥补，由此造成的断裂将是这个民族长久的创伤。

万幸，在受害者那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一抹亮色。替陈懋智先生藏金条的罗先治先生，跟陈懋智先生素不相识的余长远先生，他们在饱受摧残之后并没有记恨他，反而体现了宽容和理解。他们才称得起“脊梁”。

《渴望吃肉》和《读书梦》记载了过去普通中国人的灵与肉、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困境。

如今，中华民族在经济发展的单轨上猛跑，以为只要不断加快脚步，不回头看，就能甩掉挥之不去的过去和纠缠不休的冤魂。它做得很“成功”。但终归徒劳，因为这就像要甩掉自己的影子。

灵魂哭泣的日子

——我经历的“三反”运动 陈懋智遗稿

打虎队遍布城乡

1951年秋，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三反”运动，那年我35岁，在四川省忠县（今属重庆市）县政府财粮科当会计，亲身经历了运动的全过程。

对于“三反”运动的全部知识，最先都是从报上知道的，报上讲，中央要在全开展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又报道，天津已枪毙了大贪污犯张子善、刘青山。当时我觉得，那些运动离我们都太遥远，甚或没有什么关系。后来发生的事情，才使我明白，自己当时的想法是多么幼稚。

“三反”很快就推向全国了。

11月26日，忠县召开了“三反”动员大会。县领导在会上要求人人投入运动，个个认真检查。直到这时，我仍天真地认为这场运动与自己无关，因为我第一绝无贪污，第二绝无官僚主义——那是官们的事，第三连浪费也说不上。后来按上级的要求反复检查，发现自己也许在工作中对纸笔墨砚的浪费还是有的，比如财粮科由我负责计划印制了一批专收过往木船码头使用费的收据，印好后上级指示停止征收码头使用费，尚未用完的上千本空白收据就成了废纸。这虽不是我的责任，但至少是在我手中造成的浪费，我将此项费用进行了认真清点，准备作为“浪费”来进行自我检查。

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浪费”根本无人过问，“官僚主义”也只是虚晃一枪，“三反”实际上只剩下了“一反”，那就是反贪污。

这时中央公布了《惩治贪污条例》，其中我印象深刻的两条是：一、贪污从解放之日起计算；二、贪污金额达亿元（旧币，折新币万元）者处死刑。

忠县的“三反”运动开始声势浩大起来。一天，县里召开公审大会，当场枪毙了贪污分子易献邦，据公布的罪行，易献邦贪污了300万元（即新币300元），这与中央规定的死刑罪相去甚远，不知怎么竟枪毙了。这一下在全县引起了震动，恐怖气氛顿时笼罩了全县。

根据运动需要，县里成立了专门清查贪污分子的组织，大名叫“增产节约领导小组”，由于当时一律将贪污分子称为“老虎”，这个专门组织又叫做“打虎队”。随后，各部门、各城乡纷纷效仿，一时打虎队遍布城乡。

打虎队在街上贴出大幅标语：“搜山打虎，层层包围，内外夹攻，穷追猛击”，大造声势。事后得知，这四句气势汹汹的话是上级统一布置的。

我所在的县府机关打虎队由范梓里任队长（范梓里，地下党员，毕业于四川乡村教育学院，时任县府秘书，当时没有副县长也没有县府办，秘书权力极大），陈顺平、杨大玢（女）、罗明等任队员。这些平常和我共事于一个机关的人，自从参加了打虎队后，一下就变得威严起来。

骇人听闻的诬陷

各路打虎队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行动，不断传来某某“老虎”被揪出来的消息，其中很多是我熟知的人，平素为人正派清白，忽然成了老虎，令人闻之胆寒。最典型的有这样一些：乌杨税务所所长任某，认定的贪污金额竟远远超过了这个所全年应收税的总额。

财粮科陶里汉，本县城关人，我的同事。他的工作是填发粮食支拨书，并不掌管一粒粮

食，却被强迫承认盗卖公粮 10 万余公斤。而 10 万余公斤粮食不是可以轻易盗卖的，它需要 100 个精壮大汉连续背 15 天才能运走，陶里汉不可能如此作案。

城关镇税务所副所长秦兴联，本是进驻白石区的打虎队长，不料几天后，自己也被打成老虎。原因是他听说自己的同行，拔山税务所王群被认定贪污 5000 万元，感到十分惊诧，他知道拔山税务所全年税收计划才 9000 万元，如何能从中贪污 5000 万元呢？他仅仅为王群说了几句公道话，当即被撤职，打成老虎押进忠县看守所。

这样的例子每天都能听到，一时风声鹤唳，人心惶骇，县府大院里的气氛紧张而恐怖。

威风凛凛的各路打虎队每天都拥到县府来报捷，哪里又有老虎落网，哪里又有老虎被抓出来。接着，各路打虎队开展了竞赛，看谁打的老虎更多更大，这样一来，运动就像无缰的野马一样放纵起来。

那时有一个很新鲜的说法，叫“帮助”，打虎队对每一个人的诬陷和摧残，都称为帮助。你不认罪，就帮助你认罪，你不交代，就帮助你交代。他们并不需要清查帐目，更不需要证据，说你贪污多少就是多少，决不容申辩。倘若你一定要申辩，他们就开始“帮助”你了，用绳索把你捆起来，吊在屋梁上，再用棍棒毒打。有的人受不了，只好被迫承认贪污；有的则自杀身亡。

陶里汉跳楼

我最忘不了的一幕，是陶里汉跳楼自杀。

陶里汉被认定盗卖公粮 10 万余公斤后投进了监狱，但打虎队不满意，还要他继续交代。陶里汉被押回机关接受斗争。

在县政府办公楼二楼会议室里，由范梓里主持斗争大会。陶里汉躬身垂手站在台前，对自己的“罪行”进行交代，在一再胁迫下，他被迫不断增加自己的“贪污”金额，一直加到了 9900 万元。范梓里还嫌少。陶里汉心里清楚，根据当时的政策，贪污到 1 亿元就要枪毙，所以到了 9900 万，他就不敢再往上加了，他想保命。

但范梓里非要陶里汉继续交代。这明明是要陶里汉的命，他哪里敢再增大贪污额！

只见范梓里怒气冲冲猛力把桌子一拍，大叫：“再不说，休想过关！”整个会议室的气氛一下紧张起来，人们面面相觑，不敢出声。

陶里汉愣了！忽然，他扬起头来飞步向会议室的窗口跑去，纵身一跃跳下楼。

这一瞬间发生的事情把所有人都惊呆了。我当时就在离陶里汉很近的地方，心里格登一下，心想这下陶里汉完了。

斗争会被迫中断，范梓里气急败坏地跑下楼去，我们也都跑到了楼下。陶里汉摔倒在石坝里，全身扭曲成一团，痛苦地呻吟着，原来他没有摔死，只是左腿摔断了，鲜血的血正汨汨地流出来。

我们急忙上前想把他扶起来送到医院抢救。范梓里却指着他说：“你是罪有应得，你想借此威胁领导！”然后他回过头：“不准任何人扶他起来，要他跟着我爬回看守所去！”

不久，陶里汉被判有期徒刑 10 年。由于跳楼，他留下了终身残疾。刑满后，陶里汉继续留在劳改农场劳动，直到八十年代才回家。他曾到我家来看我，我惊讶地发现，他已成了废人，身上随时挂着尿瓶，从腰间插管排尿。1984 年，也就是蒙冤 31 年后，他终于获得平反——经复查无分文贪污，但这时，他已到了晚年。几十年里，他的儿女也为他受尽了歧视。1992 年，陶里汉病逝。

老虎上街咬伤（商）人

打虎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各区乡的老虎不断解押来城，还有从外地解押回来的，总共数百人。被安上的名号有大老虎、小老虎、母老虎、公老虎等，县里的看守所一时“虎满为患”。县政府大门右侧临时改建成大监狱。

监狱里的刑罚非常残忍，秦兴联在四十七年后的 1998 年对我讲了这样一些情节：

秦兴联被绳索捆绑成草把子一样，动弹不得，全身皮肉都变绿了——身上至今仍有绳痕；

王群被吊“半边猪”，即捆一只手悬吊在空中，像开膛后挂起来的半边猪一样；

沈士林（时为巴营乡财粮干部，后曾任县林业局长）被按在长板凳上罚跪，膝下加两根尖硬干柴块；

尹光祥（时为拔山税务所干部）被带上手铐脚镣，脚镣重 10 余斤，一分钟才能移动一步。

20 多年后，这些人都被证明是清白的，未贪污分文。

在刑讯逼供下，几乎所有人都被迫承认了自己的“贪污行为”，他们以为“坦白”了就会从宽（当时甚至出现了争相坦白的“大好形势”），其实大谬不然。接下来，打虎队开始追赃——这才是运动的真正目的。

被屈打成招的人本来就没有贪污，拿什么去退“脏”呢？

打虎队的办法很快就出来了，第一是把你家中值钱的东西全部掠走充数，第二是授意你将所谓的赃款转嫁到一些商人身上，把商人的财产掠来“退赃”。

第一个办法已经惯见不鲜，第二个办法却闻所未闻。具体地说，就是要老虎们编造谎言，硬说曾把贪污的钱借给了某个商人，这样，打虎队立马就以追赃为名把那商人掠夺一空。

老虎们开始也不愿意味着良心去冤枉商人们，因为他们之间从没经济往来，甚至根本不认识，更不要说借钱给商人了。但后来出于无奈，只好纷纷咬住商人不放，把商人们搞得头晕目眩不知所措。那时天天都有贪污分子被押着上街追赃，商人们避之惟恐不及，因此社会上流行一句话：“老虎（贪污分子）上街咬伤（商）人。”

没有多久，商人们便被整垮了，许多商店关门，市面上冷冷清清。

我被投进监狱

运动搞得越来越离谱。

腊月 26 日，我的四哥陈懋敏（重庆法政专科学校毕业，运动开始时在县粮食局建仓委员会工作）忽然也被抓进监狱。这一年的春节，我们家里没有一点喜庆气氛，全家都在为四哥担忧。

厄运很快又降临到我头上。正月初四下午，范梓里通知我去城隍庙交代贪污。我知道大祸临头了。

城隍庙是当时全县最大的集会之地，场子里可坐七八百人（后来改建成忠县剧场）。我一进会场，看见台下密密麻麻坐满了人，不禁十分紧张。

主持人要我坦白交代——可我明明没有贪污啊！我吞吞吐吐，不知怎么说好。台下爆发出一阵如雷的咆哮，说我不老实，很多人一起伸出手来气势汹汹地指着我不准我再说话，改由群众检举。

这真是难得的场面，一些素不相识的人怒火万丈争先恐后地检举我，这个说我解放前在下王庙仓库卖米几十石，那个接着就说是几百石，把我搞得啼笑皆非。

根据《惩治贪污条例》，贪污是从解放之日起计算，怎么一下子扯到解放前去了？再说，我解放前是在田赋粮食管理处任职，根本没在下王庙仓库工作过，怎么会在那里卖米几十石、

几百石呢？退一万步说，就算我在下王庙贪污了，这些检举我的人和我根本无交往，也并不相识，又怎么会知道？

开始我还想记住检举的数目，后来根本无法记了，因为总数已经超过了万石。发言的人越说越激愤，会场空气紧张到极点，直到三个多小时后宣布散会时，有的人还没轮到发言。就这样，我成了大老虎。

散会后天快黑了，十几个持刀佩枪的公安人员一涌而上，不由分说便将我押到了城西老官庙看守所。

四哥被打断了手

我被推进牢门，意想不到一进去就看见了四哥。四哥胡须满面，憔悴不堪，和我骤然面对，欲哭无泪。说不出话来，只是无奈地打个手势，示意我去他旁边睡。

我一转身，又见到我的上司——财粮科长史曰凯，这位军人出身的山东大汉居然很幽默的把手放到嘴边做了一个吹军号的姿势对我说：“我在这里吹归队号，大家都进来！”他指的是财粮科总共不到10人，已先后有史曰凯、李远谋、代心辉、陶里汉和我共5人进了监狱。

监狱里警卫森森，监规极严，入狱时钢笔、皮带等都要收缴，离开自己的位子要报告。一会儿，县公安局局长王惠东来训话，他恶狠狠咬着牙说：“串供杀头！”吓得大家不敢交谈。

晚上入睡后，四哥悄悄对我说，别人认为我两兄弟的问题都很大，虽然是无中生有，但办案的人不问青红皂白，说不定会把我们兄弟二人拿去做典型一起枪毙。我叫四哥不要太焦虑，可能问题不会那么严重。

第二天下午，四哥被押出去审问。回来时，我惊讶地发现他的左手用布条挂在胸前——他的手杆被打断了！我万分痛心，暗暗流泪。四哥说：“不得了啦！飞来的横祸，我没命啦！”

原来，四哥被押到商会接受斗争，很多不相识的人一口咬定他在仓库卖了多少粮，连钱是如何交的，粮是如何出的都说得活灵活现。四哥知道这些纯属捏造，就坚不承认。打虎队说他不老实，把他和另四个人吊成一排。打虎队员尤振西和石少成操起大木棒一阵乱打，四哥的左手当场就被打断了。打虎队也不给上药，只找根布条挂起就押回监狱。

四哥和我的谈话声音很轻，竟也被人听见，向监狱长报告了，监狱长马上把我们叫去一阵训斥。监狱长是山东人，长得牛高马大，他从墙上取下一根皮鞭在桌上猛抽，发出啪啪的声音，吓得我们心惊胆战。接着他又取出一副手铐，在手里咣当咣当抖动着走过来，猛的把四哥的两只手拉拢咔嚓一下铐了起来。四哥的手本来刚被打断，一点药也没上，现在又加上一副手铐，其剧痛可知，愁容满面的四哥顿时眼泪滚滚而下。

回到牢房，狱警命令我们立即分开铺位各住一边，从此我兄弟二人就不能交谈了。

晚上监狱开大会，一向品质恶劣的邓觉（天堑乡人）在会上跳起来大放厥词，说陈懋敏、陈懋智解放前狼狈为奸欺压群众，罪恶累累，现在又共同贪污作案，强烈要求从严惩处等等。这真是雪上加霜，落井下石，虽然管理人员当场未置可否，但我兄弟二人已惊骇不已。

这一天正好是我妻的26岁生日，那时她在位于北碚的川东行署人事局工作，数百里之外的她，要是知道了我入狱的消息，不知有多难过。转而又想到家中的父母，这几天正是家家团圆过年的喜庆之日，而我和四哥竟然双双入狱，父母不知又是何等痛苦。

第二天清早起床后，全牢房的人都挤在一只盛着热水的木桶前轮流洗脸，热水腾起一团迷蒙的雾气，天还未亮，彼此都看不清（那时没有电灯，都是油灯照明，光线很弱），趁着这机会，我和四哥偷偷靠在一起轻轻说话，不知从哪里猛的传来一声怒喝：“串供杀头！”那话虽然不是对我兄弟二人说的，我们也吓得够呛，赶紧分开。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上午忽然传我出去，我心中忐忑不安。到了门外才知是押回县府交代罪行，想到四哥昨天出去被吊起来打断了手，便惶恐不已，但事已至此又有什么办法。

到了县府机关，会议室里已坐好了打虎队的几个队员。都是平时机关里的熟人，我心里便稍稍轻松些。

范梓里和颜悦色地要我坦白从宽，但我实在不知如何坦白。一会儿他就沉不住气了，开始凶相毕露，陈顺平、杨大玢、罗明等也威严起来，会议室实际上成了审讯犯人的公堂。

我小心翼翼地向他们陈述解放后我在财粮科只管几本帐簿，手中并无一分钱一粒粮，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去哪里贪污上万石粮食呢？

范梓里睁大了眼睛，伸出手来指着我一字一顿地说：“你要很好地将解放前的贪污交代清楚！”我立即举出《惩治贪污条例》中的明文规定：“贪污从解放之日起计算”，要求他们执行中央的政策。

这时旁边的几个打虎队员一起嚷起来，说的内容竟是一致的（显然预先作了周密准备）：“你的情况不同。中央确实规定从解放之日起计算贪污，但解放前的粮食从解放之日起就要被人民接管，如果你不贪污，还不是落入人民手中吗？虽然你贪污是在解放前，实际上贪污的是解放后的，所以要你交代是符合中央政策的。”

我听到这种诡辩，气结于胸，无言以对。

范梓里的脸沉了下来，空气开始紧张了。

过了一会儿，他装出很关心我的样子，“语重心长”地说：“你认真回忆一下，解放前贪污了多少粮食？出卖给了谁？其实嘛，这些我们早已有数了，只是给你一个坦白的机会，看你老实不老实。嗯，你看，我们对你是很客气的，没有伤你一根毫毛”。说到这里，忽然语气一转，冷冷地说，“我们的克制是有限度的，现在对你是和风细雨，非要急风暴雨就大伤感情了哟……”

我听出他在暗示我，再不坦白就要动武了。想到四哥被打断的手，想到陶里汉摔断的腿，想到很多人受的肉刑，为了免受皮肉之苦，得想办法图个暂时平安。我脑子里飞快地思索着：怎么办？

我想起了四哥告诉我的话，打手们在吊打他时，诬他贪污了多少粮食，买粮人是某某，他一直没有承认。这些数字和人名我都记得，此时无路可走，干脆把那些都一概说成是我的贪污。

我打定主意，便主动“坦白”了。

范梓里和几位打虎队员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露出掩饰不住的成功的喜悦。

罗明打开抽屉，取出一张单子“认真”看了看，举起来朝我一晃，又转身对范梓里说：“他交代的几笔贪污和别人检举的相符”。我心里暗暗好笑。

范梓里的态度立即转变了，笑着说：“这样好嘛，走坦白从宽的道路。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好，你坦白的与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不差。”

气氛轻松起来，打虎队员们都像打了大胜仗一样高兴。一起莫名其妙的贪污便定下了“铁案”，而我仅仅是从四哥那听来了几笔子虚乌有的数字。

范梓里和几位队员凑到一起拨着算盘，我知道这是将粮食折算成金额。我打了半辈子算盘，从来没有哪一次算盘珠的声音像这一次这么刺耳，啪啪啪，象刀子在剜心。

一会儿，我的“贪污金额”算出来了：7600万元！如此天文数字，我用什么去“退赃”？就是把我的油榨尽也榨不出呀！

敖陈二人双双跪在地上

由于我“坦白”得好，被解除牢狱之苦，转移到了县法院反省室。

比起监狱，这里好多了，关在这里的都是被认为贪污情节较轻或坦白较好的，首先是没有武装看管，其次是彼此可以交谈，再没有“串供杀头”的怒喝声。

我小时的同学刘以臣也关在这里，他是忠县工商联主任，罪名是盗窃经济情报。这个老实的人以为经济情报是一张报纸的名字，审讯时，他坚决不承认，理由是“我从没订过经济情报”，把那些凶神恶煞一般的审判员都搞得哑然失笑。

在闲谈中，大家说到退赃，议论起城里现在到底谁还钱多。刘以臣对工商界情况比较了解，他屈指算了算：“看来只有余长远了。”

不几天，打虎队令我回家积极准备退赃，这样，我回到了父母身边。当晚向父母和四嫂详述了四哥在狱中的情况，母亲和四嫂悲泣不已。

用什么来“退赃”呢？7600万元啊！

想了想，我在银行存有34元（新币），那是妻子从川东行署寄回的生活费，用长子陈储德（两岁）的名字存入的。可是父亲却告诉我，我入狱后，家中过年缺钱，去银行取，银行一位姓袁的干部恶狠狠地说：“陈储德是陈懋智的儿子，这笔钱已没收退赃了！”（袁五年后被打成右派死于狱中。）

又反复回想，想起解放前我曾经放过的两笔账，一是石印铺老板敖方兴300元，二是杂货铺老板陈智洪100元。这两笔账解放后不敢去收，怕落个解放前放债“大利盘剥”的罪名，戴上剥削阶级的黑帽。但是现在为了“退赃”就不得不收帐了。

我把这两笔账向打虎队交代后，队员们喜形于色，立刻派人持枪将敖方兴、陈智洪押到县府来。二人知道凶多吉少，一进来就扑通一声双双跪下答应交款。

敖方兴已是年逾古稀白发苍苍的老人，去年镇压反革命，他的儿子敖金辉被公开枪决了，从那以后他就失魂落魄如惊弓之鸟。他跪下后说话稍有迟钝，一个年轻的打虎队员上来就啪的甩了他一耳光，厉声说：“你儿子是被枪毙了的，你是个反属，还敢不老实”！这正戳到了敖方兴的伤心处，他吓得魂不附体，眼泪汪汪，连连叩头。

陈智洪（江西人）开杂货铺小有积蓄，这一向已被许多老虎咬了，积蓄差不多都已代人“退赃”。事后得知，他吃苦最多，打虎队不分白天黑夜押他到太保祠（鸣玉溪边的秦良玉祠）去斗争，要他将双手平伸，在手心各放两块砖站通宵，折磨得汗水鼻涕眼泪不断流淌，几次昏倒。我这笔账是他把家里能变卖的东西都卖了才交清的。

无处藏身的金条

以上款项显然不够。

我想到了解放前购买的四根金条——那可是我辛辛苦苦挣的，要拱手送出去，真是剜我心头的肉啊！

那时抄家掠财掘地挖宝已成为风气，我害怕金条被抄，反复转移地方，都觉得不安全。

起先我把金条藏在墙洞里，过了两天放心不下，又取出来用瓦罐装好埋在地下。再过两天还是觉得不妥，又挖了出来。回头看见两岁的儿子储德正坐在竹制童椅上，心生一计，将童椅的竹节打通，把金条放进去，两头塞上木条。这样，储儿每天坐在童椅上，一定会有人起疑心，肯定万无一失。那几天，我的心思都放在储儿的童椅上，回到家中首先就是去掂一掂。

过了几天，我还是不放心，又在夜深人静时关好门窗将金条取了出来。最后我终于想出了好办法，将金条寄放到离我家不远的县邮局罗先治局长的保险柜里。罗先治为人忠厚，与

我交情颇深，完全信得过。同罗先治一商量，他满口答应。这样终于卸掉了我的心腹大患。但是我显然高兴得太早了。

打虎队一天紧似一天地逼我退赃，我知道不少人已被逼死了，再不“退赃”，说不定哪天也会老命不保。金条虽然宝贵，但生命更宝贵，我横下一条心，咬牙向打虎队交代了。

罗先治此时正在重庆邮电学院学习，打虎队火速赶往重庆，将罗先治戴上脚镣手铐押回忠县取出金条。他们胡乱栽赃，又硬说罗先治贪污了邮局全年的所有汇入款（连他们自己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持有汇票的人绝不会全年不取汇款）。罗先治最后被判刑七年——他实在无钱“退赃”。

想到罗先治的悲惨下场我就愧疚不已，他是一个多么忠诚老实的朋友啊！七年后，罗先治刑满释放，送回老家双龙乡务农，从此终生陷在农村。后来他多次来看我，一见面就喊“懋智兄”，喊我妻子“嫂夫人”，还和解放前一样，令我热泪盈眶。

万分痛心的时刻

7600万远未交清，打虎队又加紧向我进逼。

这天，打虎队问我，还有什么钱交给商人手里。我如实回答“没有”。

杨大玠开口了：“你很好地思索一下，是不是还有没想起的。有些账你可能当时没有要凭据，或者凭据丢了，这些都不要紧，你只要说得出口名字和金额，我们就有法子把帐收回来！”

这让我大为惊讶：不要凭据，只凭一句话就可以收账，天地间竟然有这样的事！

我非常清楚打虎队的意图就是要我乱咬商人。我忽然想起在反省院时刘以臣说过的余长远，城里现在只有他还钱多。我猛地打了个寒噤：难道我也要乱咬商人？

“快说，钱交给哪个商人了？”一个打虎队员提高了嗓门问我。旁边几位打虎队员都围了上来。“余长远……”三个字神差鬼使从我的嘴里一下溜了出来。我意识到失言了，马上接着说：“……可惜不认识。”

谁知我的话刚一出口，一个队员就急不可待地说：“早就有人检举你在余长远铺子搭生意（即投资经营），为什么时至今日还不愿讲呢？”

我一下愣住了：“我的确不认识这个人。”

打虎队员们的情绪激怒起来，纷纷指责我不识相，说“塞个指头在你嘴里也不晓得咬”。

范梓里气得像发怒的狮子，叉着腰在屋里走过来又走过去，“再次提醒你，你要认真反省”！他走拢来盯着我半晌不转眼，眼中象有火星往外溅——陶里汉跳楼时他就是这眼神。说实在的，这眼神有些可怕。

县府机关通讯员老马走进来，苦口婆心地开导我，“你呀你，你的脑壳硬是打不过转转！他们都说姓余的和你有关系，你就承认下来再说嘛”。末了，他长长地“唉”了一声，听起来特别意味深长。

苍天在上，我可是一辈子不做亏心事的，但现在实在被逼不过，只好承认了。这真是一个万分痛心的时刻，恪守礼义廉耻的人被迫要违背自己的良心！

范梓里的脸立即由阴转晴，堆满了笑容：“你这样才对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党的政策，你是读书人，又不是不知道。好！现在马上同余长远对质！”

“能否缓一下，暂时不对质……”我哀求范梓里。

“你既然已经承认了，还顾虑什么，对质就对质！”范梓里的火气又上来了。他转过身去吩咐老马：“马上去把余长远叫来！”又对我把手一挥：“你下去做准备。”

我的心跳骤然加快，冷汗从手心往外冒，四肢不由自主地抖起来。

和余长远当面对质

老马背着一支长枪走进来对我说：“我这就去押余长远，你在大院里的黄桷树下不要走。等会我从大门回来指给你看，我押的人就是余长远，你要认清楚，好对质。”

约一个小时后，老马背着枪回来了，走在他身边的是一个大腹便便，身着褪色蓝布长衫的胖胖的男人，约 50 岁左右。那男人垂头丧气，一脸无奈慢慢走来，身影离我越来越近。从黄桷树下经过时，老马连连向我使眼色，暗示此人就是我的“生意伙伴”余长远。

不到 10 分钟，老马来传我。

我跨上楼去，和余长远骤然四目相对，余长远一见就指着我叫起来：“问他嘛，看他认不认得我嘛！”由于急火攻心，他气得脸色发白，说话结结巴巴。

我镇静了一下，暗暗为自己打气：不要怕，不要怕，这怨不得你，你是被逼的，上天会宽恕你的。“怎么认不得？我的银元是在你楼上亲手点交的，现在怎么不认账呢？要实事求是嘛！”我不知哪来的勇气。

打虎队的人七嘴八舌跟着嚷，桌子被拍得砰砰直响，都说余长远不老实。

余长远压根儿就不认识我，更没借过我的钱，他心里是踏实的。他瞅了瞅我，很从容地说：“你既然说是在我楼上交的银元，那你当着这些同志说说，我楼上的门窗是怎么开的？一共有几间屋？”余长远料定我说不出，所以他一点不慌。

殊不知事有凑巧，一年前我因事找人上过他的楼，只是当时不知他是余长远，但楼上的大模样还记得，我就根据记忆一五一十地说了。

那一瞬间，余长远大惊失色。

“你现在还有啥话说，人家给你讲得清清楚楚，脚跛眼瞎，东西南北一点不差，你还想狡辩吗？哼！”范梓里连珠炮一样地教训起来。

余长远的头慢慢低了下去，一直垂到胸前，一言不发地愣在那里。

范梓里又换了一种语气：“陈懋智自来是个忠厚人，不会无故乱说的。你是个开明资本家，政府对你是另眼看待的，你要保持开明的荣誉，要跟共产党走。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走一个坏人……”

打虎队员们你一言我一语，轮番劝导余长远“跟共产党走”，不断问他：“思想通了没有？”好象非常爱护他的样子。

余长远一直低着头，面部的肌肉抽搐着。

我心里更痛苦，他要是死不承认怎么办？他承认了又怎么办？我假装泰然自若，内心却虚到极点，也矛盾到极点，我担心再僵持下去，精神就会崩溃。

过了一阵，余长远缓缓地抬起头来，眼中盈满了泪水，哭丧一样从喉咙里吐出了三个字“我……承……认……”

听到这三个字，我既想笑，又想哭，又想大叫，却又什么都不敢——如此荒唐的丑剧，我竟不幸是剧中的主角。

可怜的余长远

打虎队员们取得了胜利，很兴奋了一阵子。

余长远此时情绪也稍稍稳定了些，说：“现钱已经没有了，家里只有公债”。

“公债也可以，马上去全部拿来！”范梓里抑制不住喜悦，笑着对余长远说。

一会儿公债券就全提来了，点了一下，有 2000 多万，还差得远。范梓里又说：“你的‘永顺长’酱园铺生意不错，这样吧，以后每天卖的钱就全部上交作赃款。”

这以后，县府派了一个姓王的干部天天和我一起去“永顺长”酱园铺坐柜台。余长远

在一旁忙着给人打酱油称盐巴，钱却由我们如数收来装进钱柜，一分不留。钱柜由王干部上锁，每晚关门后我们三人开柜清点，记好账，由王全部带走作赃款收入。

“永顺长”是县城最大的一家酱园铺，每天销售额都在几十万元以上，这样，我的“赃款”额就逐日减少了。

更荒唐的是，在我“退赃”接近尾声时，县银行也有人说解放前跟余长远搭过生意，银行青年干部毕其衡（后任行长）也来和我们一起坐柜台，每晚打开钱柜后和我们平分营业款，为此县府和银行专门达成了协议。

又过一段时间，自称给余长远借钱搭生意的越来越多，大家天天为分钱的事扯皮，彼此都不让步。

余长远此时一律来者不拒，每天只管开门营业，让人收钱就是，连眉头都不皱一下了。

家里还有金子？

我“退赔赃款”后，以为从此平安无事，岂料平地又起波澜。

一天，民政科长张克顺忽然对我说，“你家里还有金子，你爱人就要回来交”。我莫名其妙：我家哪里还有金子呢？我妻子在川东行署劳动局工作得好好的，又怎么要回来呢？我不敢深问，只当是张克顺一时口误。

农历三月，天气转暖，我独自在大黄桷树下闲坐，等候处分。这天，恍惚看见我妻子远远从县府大门外走了进来。我疑心眼睛花了，仔细看去，真是我妻子：穿一件大花格子衣服，背着背包，肚子挺起很高——快临产了。我这才知道张克顺的话是真的。但这又是从何说起呢？

一个川东行署来的北方人陪着我妻子往办公室走去，从我面前走过时，我夫妻二人相对无言——能说什么呢？北方人对我说，我妻子只是暂时停职回家，协助弄清我的问题后就去行署复职——我不是已经没有问题了吗？还有什么要“协助弄清”的？

第二天，妻子平安回家，告诉了我全部情况。

前几天，川东行署忽然通知她，说忠县老家的堂妹陈懋芳（我幺叔的女儿）写信到行署检举她窝藏黄金。堂妹在检举信中说：“我五哥当不了家，是五嫂当家，黄金都被五嫂藏着”。行署为了支持忠县的打虎运动，才送我妻子回家交代问题的。

又一桩横祸。

我找到堂妹，问到底怎么回事？堂妹说她所在的县百货公司号召员工积极投身运动，每人必须写一份检举，她想了想，就写了五嫂。

我听了以后，气不打一处来，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堂妹毕竟才十多岁，年少无知啊。

最艰难的岁月

我妻子回家不到一个月，就于农历四月十三日生下了次子仁德。家中一贫如洗，连最低生活也难维持。我妻在月子里没吃过一点油星星，每天都吃豆腐渣煮牛皮菜，她常常抱着刚出生的仁儿痛哭，眼泪湿透了枕巾。

孩子满月后，县政府出具了我没有问题的证明，我妻子可回重庆川东行署工作。但此时我们已经困难到极点，连到重庆的船票钱也凑不起。实在无法，我妻子只好将证明寄回行署，要求留在忠县工作。行署复函同意。

运动后期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县领导说“三反”运动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并当众宣布我坦白退赃好，免于刑事和行政处分，仍回原单位工作。全场千余人顿时爆出雷鸣般的掌声，县领导亲切地走到我面前来握手祝贺，欢迎我回到革命阵营。那时我脸上挂着笑，心里

却想哭。

我恢复了自由，但家庭已经伤尽元气，吃饭穿衣都成了大问题。孩子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一个个有如乞儿，看起来好可怜！

四哥被判刑后送去奉节硫磺厂——一个极为恶劣的地方劳改厂（一年后因病回家，1962年去世，年48岁，1990年彻底平反）。四嫂没有工作，带着几个儿女无法谋生，不得已和我们一起生活，我夫妻二人以每月有限的工资供两家十余人糊口。

他们后来怎么了？

运动结束后，我专门找到余长远，向他道歉。余长远却一点也不计较，说：“我开始思想是不通，你我过去互不相识，怎么会搭生意呢？后来恍然大悟，这是他们打垮资产阶级的手段！你不来，别人也要来，反正要把我的钱整完才了事。先后来说过生意的人你猜有多少？二三十个！我想开了，一个也不推，全承认下来。唉，可惜底财已挖尽，后来的朋友我就帮不上忙了。”余长远的胸襟让我感动，我们后来成了很好的朋友。余长远为人厚道，得享高寿，活至80多岁才去世。

逼迫我的几个打虎队员在后来的运动中竟也成了斗争对象，受尽冤屈和侮辱，结局都很悲惨。杨大玢因反革命罪开除回家；陈顺平被打成忠县第一大右派送劳教，后回家病死；罗明被查出三青团身份打成右派开除回家。

范梓里最惨。文革时他在石宝中学任教，被打成大叛徒，反复斗争拷打至死，尸体抛入长江。据说学生们打死他后吊起来制造自杀假现场，然后当着他女儿范梅娟（曾与仁德同学）的面，把尸体放在一块门板上抛入石宝寨下的长江。由于那儿是回水沱，尸体流出去又漂了回来，再推出去，如是者三，才被激流卷走，真是死无葬身之地。（陈仁德整理）

作者简介：陈懋智，重庆市忠县人，出身书香世家。1936年毕业于刘湘创办并任校长的四川财政学校，该校学生是四川现代财会制度的开创者。陈懋智先生1949年以前在上海、武汉、贵阳、重庆等地做财务管理工作，1949年后在忠县财政局任总会计。2005年11月7日去世。他的著作有《重庆武斗日记》、《浮生杂记》等。

渴望吃肉

陈仁德

当减肥成为时尚话题的时候，我们已经渐渐忘记了——肉食匮乏的时代刚刚离我们而去，就在三十年前，我们曾经是多么渴望吃肉！

1971年冬天，已经插队三年的我，以生产队毛泽东思想辅导员的身份参加了一次在新阳大队（今忠县复兴镇新阳村）举办的全公社农业学大寨学习班。我所在的水坪大队参会的共有20多人，包括每个生产队的正副队长。使我终生记忆深刻的，不是如何在会上斗争阶级敌人，也不是如何强迫那些从未读过书的农民背诵“老三篇”，而是学习班聚餐时，每个到会的人可以吃到一片薄薄的肥肉。

这是一片多么令人垂涎的珍稀无比的肥肉啊！约一寸宽，两寸长，八片肥肉顺着放在一个土碗里，再堆上一些红苕，就成了香喷喷油腻腻的粉蒸肉。

开饭时，肉端上桌来，围着方桌的八条汉子16只眼睛便一起死死盯着，等着为首的人

叫一声“吊主哦——”，便一起伸出筷子（吊主是扑克术语，意为打出主牌），转眼间，八片肉便无影无踪了——比猪八戒吃人参果还快。

人们都懂得规矩，知道每人只有一片（炊事员已经精心数过了），谁也不会一次拈两片。

我和水坪9队队长王成生同桌，我看到王成生——一个约40岁的包着白帕子的下巴尖削的农民，把那片热气腾腾的肥肉挟在筷子上轻轻地闪了闪，又凑到鼻子前使劲嗅，却没有喂进嘴里。他盯着肥肉犹豫了一下，毅然放下筷子，伸手从裤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废纸，将那片肥肉很小心地放在纸的中间，四面对折过来包成一个小包，放进裤袋。

“我么女儿好几个月没有吃肉了，我给她包回去”，王成生用非常平静的语调自言自语。

我的心顿时“咯噔”一下，感觉像刺进了一根尖利的针，那一刻，我无法吞咽口中的食物。我被震撼了。那是一种铭心刻骨的震撼，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忘却那种针刺一般的疼痛。

王成生身为一队之长尚且如此，广大的社员兄弟就可想而知了。王成生用筷子轻轻拈起那薄薄的肉片的一瞬间，所有关于幸福生活的美丽谎言全部被击得粉碎！

让我再讲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故事吧，这是我的挚友、原四川人民出版社《龙门阵》编辑杨启宇（笔名安知）先生亲身经历的一件事。

当年，他在四川安县插队（他的笔名就是这样来的，安知——安县知青），那是一个十分贫困的山区县，不消说，吃肉是非常奢侈的事。杨启宇所在的村上有一个青年农民父母双亡，生活极其艰难，连充饥的糠菜都得不到保证。为了偶尔吃饱一顿饭，他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奇而又奇的苦方：当村里有人来客，主人家饭做好时，他便趁人不备，假装不小心把灶台上的煤油灯打翻到饭锅里——饭里浸满了煤油，当然不能再吃，这下就成全了他——独用大碗盛起来狼吞虎咽吃个够。

1975年，农村开始大搞计划生育，强制推行男性绝育手术，当时的政策是每个做了手术的人，可以免费享受两斤肉。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对这两斤肉向往不已，竟毫不犹豫地要求做手术，手术工作队考虑到他是出于自愿，而且绝育手术任务本来就很难完成，就给他做了。这个青年农民如愿以偿，喜气洋洋地得到了两斤肉。

在这个青年看来，生育能力对他毫无意义——连哪天饿死都不知道，哪里还想娶妻生子传宗接代。

如果说以上两个故事都是发生在贫困农民家中，那么，下面的故事将告诉你，即使男人在城里当官，家里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的家乡忠县教育局局长陶某，是一个兢兢业业的老干部，当了二十多年局长，家就在忠县三汇乡下，老婆在家务农。

七十年代后期的一天，陶局长和县里几个干部一起下三汇工作，顺道回家看看，几个干部也跟他一块儿去了。

陶的老婆见丈夫带了客人回家，忙进厨房做饭。可是翻遍了坛坛罐罐，竟然找不到一样可以款待客人的东西——家里早就没有肉了。

客人们在堂屋谈笑风生等着吃饭，女主人却在厨房独自流泪。

过了一阵，陶到厨房看饭做得怎么样了，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他老婆已经在厨房上吊自杀了！

就因为肉待客，一个善良的鲜活的生命就这样终结了。

更大的悲剧是，渴望吃肉而不得的我们，居然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最伟大的时代，享受着世界上最美好的人生，而世界上另外三分之二的人民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日夜夜等待着我们去“解放”，救他们出水火，带领他们走上“康庄大道”。

幸好所有的神话和谎言最终都被无情地打破。推开国门，我们看到真实的世界。从此，一切真相大白！

读书梦

陈仁德

对“有教无类”的颠覆

孔夫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有教无类”，认为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据称中国进入了最美好、最优越的社会主义时代，可是许多人反而被剥夺了这一权利，被赶出学校的大门。

我不幸出身于读书世家，这一点决定了我还在娘肚子里就已经被剥夺了受较好教育的权利。过完 13 岁生日，失学的危险开始降临，那时我刚念完小学。

那是一个火热的夏天。七月，我通过升学考试，顺利拿到了忠县一中（今忠州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就在我准备报名入学时，却被告之通知书无效，理由是学校的大门要向贫下中农敞开，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不能入学。

我当时还不懂得悲伤，只是痴痴地愣着。父母十分伤心，儿子才 13 岁就失学了，今后怎么办？

经典对话

父亲那时在县县委财政科作会计，与文教科在同一座楼房办公。工作人员朝夕相处，彼此都很熟悉，父亲便去文教科找一位姓李的女干部，希望能解决我入学的问题。

那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永远难忘的日子。当时李干部正坐在藤椅上看文件，她一边看一边漫不经心地听我父亲陈述，当她明白来者的用意后缓缓地抬起头来，眼光在父亲脸上足足停留了三分钟，好象从来就不认识似的：“听说你们家世代都是读书人，是吗？”

父亲不知这话的用意，就老实地回答：“是的呀。”在他心目中，读书是一件很高尚的事情，所以只要说到祖宗就有几分骄傲。

李干部接着又很认真地问：“那么，你算一下，你们家到现在一共有多少代读书人了？”

父亲心里那点可怜自豪感就又一次冒了出来。他屈指计算了一下：“据我所知，从晚清以来共有四代读书人了。”

父亲以为接下来要谈我入学的问题了，谁知李干部忽然将手里的文件往办公桌上一扔，长长地冷笑一声，眯着眼睛很鄙夷地说了一句谁也意想不到的话：“既然你们已经有四代读书人了，还想读什么书？该让别人去读书了！”

父亲当时的狼狈可想而知。他不知道自己怎样从那间屋子走出来的，只感觉到，当他转过身，有一道可怕的目光像利剑一样从后心穿过来。

父母无计可施，只好送我上一所民办中学。民办中学条件很差，在社会上备受歧视，一般都是“黑五类”子女或者“红五类”子女中成绩太差的人，实在走投无路了才会去，有人喻之为“社会渣滓收容所”。

第二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本来就惨淡无光的民办中学被彻底砸烂，校长被拉出去“假枪毙”，又打成重伤不能下床，学校全部瘫痪，学生四出串联。

我终于失学了。

亲手焚烧祖宗的藏书

文革使中国进入了文化毁灭的时代，古今中外的所有优秀文化统称“封资修”，读书人都成了罪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书店里除了毛泽东著作之外什么也没有，对于一个渴望读书的少年来说，那是一个多么绝望的时代。

在那个年代，我家世代藏书数万册全部付之一炬。

其实，并没有人来强行焚烧，都是我们自己乖乖地背到长江边去燃起熊熊大火烧掉的。经过十多年政治运动反复折腾后，我父母天天如同惊弓之鸟，好像随时都会大祸临头，一有风吹草动，马上想如何躲过灾难。文革掀起破四旧的高潮，父母当机立断，决定自己革命，不要等别人来抄家。

1966年炎夏，我们家族的兄弟们用大背篓把祖上留下的那些珍贵典籍，包括列祖列宗亲笔撰写的多种著述，家传的大量名家字画全部背到长江边上点火焚烧。大火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江边厚厚的石梯都烧裂了，才终于将堆成山一样的书籍化为灰烬，江水卷起的浪潮将灰烬慢慢冲走，江中出现了一条长长的黑色灰烬带，直到很远很远……

但是我依然做着读书的梦。

焚书高潮过去后，局势稍微平静了一些，父亲听说某前辈还藏有一本《唐诗三百首》，在我的请求下，父亲鼓起勇气去借回了这本珍贵无比的书。那位前辈胆战心惊，一再叮嘱万万不可为外人道，并且必须在一周内完璧归赵。我连夜将全书抄了下来，从此便有了自己的第一个读本。

公安员收缴《西厢记》

1976年，我在重庆工作的叔叔把他保存的一本爷爷读过的《西厢记》送给我，爷爷在上面用毛笔写着许多批注。这是解放后我叔叔买的，爷爷发现不同于以前的版本，就凭记忆用蝇头小楷将全书还原，这足以证明爷爷的饱学和惊人的记忆力。不仅如此，爷爷的小楷之漂亮也令人称奇。

这本书却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那年我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女友（后来成为我妻子）。她在一所山区小学当教师，偶然见到我的《西厢记》，要借去看，我当然不能拒绝。在一再交代这本书对于我的重要性和可能带来的危险之后，我把书给了她。

回校后不到一周，有一天，她发现学校里气氛十分紧张，校长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她。她感觉要出事了。一会儿，公社的公安员带着几个民兵神情严峻地出现了，他们直接到她的寝室，问她最近看了些什么书。她心里咯噔一声，随即假装镇静，说了几本革命书籍。公安员便提示她，有没有看过立排版的书？她依然假装不知道。

公安员在寝室里很不耐烦地走来走去，忽然走到床前猛掀开枕头，从下面抓出了那本《西厢记》，然后回过头冷冷地问：“这是什么？”

女友就像做了坏事一样抬不起头。

事后得知，是一位关系密切的年轻女老师出卖了她。

公安员随后将《西厢记》交给了区文教助理万世之，万在后来的一次大会上就此进行了严肃批评，让我女友很狼狈。

这事很快通知了我的工作单位，公社革命委员会一位姓刘的副主任对我说：“好反动啊，全是立排版的！”我回敬他：“立排版的不一定是反动的，毛主席著作也有立排的。”主任狠狠瞪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

当年九月，毛泽东去世，随后，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次年一月，我在《人民日报》上偶然看到《西厢记》的名字——居然被称为优秀民族文化作品！我一下激动起来，马

上给那个文教助理去信，要求归还《西厢记》，但是没有回音。我又连续给县委宣传部去了三封信，要求督促归还，依据就是《人民日报》的文章——这在中国是所向无敌的。最后，我终于拿回了那本受尽侮辱的《西厢记》。